

中国：双重转换中的波动趋势

● 杜辉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中国经济探索

ANGDAI ZHONGGUO
JINGJI TANSUO



中国：双重转换中的波动趋势

● 杜 辉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范远汇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中国：双重转换中的波动趋势

杜 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祝槐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3 字数 153,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1385-3/F·243

定价 5.00 元

出版前言

举世瞩目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发展中，实践中。

理论来自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与开放的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这是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的任务。

为了反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我们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经济探索”丛书。

“当代中国经济探索”丛书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从不同侧面进行深入、系统的，带有开拓性、突破性的探索和研究，力求体现当前我国经济研究的新成果。这套系列书的问世，希能对推动理论与实际结合，活跃经济研究，指导经济实践，起到应有的作用。

序

肖灼基

研究社会主义经济波动问题，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早在本世纪 50 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卡宾斯基、切林斯基、奥斯卡·兰格，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戈德曼，苏联经济学家诺特金等人，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波动，并对波动的成因、周期、特点等问题作了一定的探索。在此同时，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波动问题也作了一定的研究，取得了若干进展。

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进展较快。这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也为研究积累了较丰富的资料。杜辉博士就是较早从事经济波动问题研究的学者之一。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他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成果。这本书的前身是其博士论文《论双重转换中波动趋势的改变》，论文选题新颖，见解独到，逻辑严谨，文笔流畅，在由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主持的答辩会上，得到专家们的高度评价，认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现在该文经作者修改补充，公开出版，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理论来源于实践。杜辉博士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搜集了大量实际资料,尤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深入的剖析,并且从中概括出许多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区别、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关于双重转换时期经济波动的趋势等论述,有着深厚的实证基础,根据充分,论述深刻,令人信服。

本书在认真吸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作了新的探索。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经济波动的研究,侧重即期分析,以即期的投资、产量、货币、供给、需求、经济政策为考察对象,本书作者则立足于长期分析,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时期波动特点和波动机制的差异;当人们侧重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波动时,本书作者则从改革与发展的双重角度研究波动,拓宽了研究的领域,深化了研究的内容,提出了创新的见解;作者在长波效应、工业化阶段效应、常态波动合理界限、预警指标的设计等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见解,分析透彻,论述深刻,推动了学术的进步。

本书作者杜辉博士是一位有着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广博的经济学专业知识、思维敏捷、勤奋好学、勇于探索的年轻学者。本书是他几年来研究的成果。作为杜辉同志的导师,我愿意向读者介绍书中若干重要理论观点,并加以适当的评论,期望引起读者的讨论,以推进我国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一、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资本占有之间的矛盾,论述了资本主

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生产过剩的瘟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伴侣。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就必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会不会出现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经济波动？如果社会主义经济发生波动，其原因又是什么？对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人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本书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作者认为，事物总是波浪式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能保持直线上升的方式，而明显地存在着波动。波动是经济发展借以实现的一种方式。我国自解放以来就出现了八次经济波动。但是，波动与危机不能划等号。波动有两种类型：常态波动和超常波动。危机作为超常波动，是波动的一种类型。

像资本主义经济波动一样，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也是其基本矛盾的产物。但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具有对抗的性质。因此，一般说来，社会主义的经济波动，往往是常态波动；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产生经济危机的客观必然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完全消灭了产生经济危机的任何可能性。在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经济运动自发性较大，人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具有局限性，一些非经济性因素也时常发生作用，因而，有时是可能发生危机的。我国解放以来，就曾经出现三次超常波动，或者叫做危机性波动。其中，1961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为-62.54%，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26.17%；1967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为-26.33%，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9.41%；1976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为-3.85%，社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1%。这三个年份，波动幅度如此之大，显然已超出“常态波动”

的范围。

本书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只是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波动的图景,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波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区别,阐明社会主义偶发性超常波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而且还在于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原因。作者认为,只要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存在,经济发展就必然出现波动。作者明确指出:“只要是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只要是社会化生产,本身就蕴藏着经济失衡、经济波动,乃至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这个认识是十分正确和深刻的。

第一,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按比例分配的客观要求与各部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必然引起经济的波动。我们知道,为了使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各部门必须按比例发展。但是,在再生产过程中,由于各部门技术变化、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增长等的速度不同,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如果说,在某个再生产周期的初始阶段,社会总劳动在各部门分配还是较均衡,各部门之间的比例也较协调的话,那么,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后,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原来的均衡会转化为不均衡。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出现了所谓长线和短线。这就需要调整比例和速度,经济增长就必然出现波动。

第二,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也是经济波动的原因。供给与需求,是市场中两个经常变动的因素。社会的供给总量,由于技术、劳力、资源、能源、运输、外贸、管理等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扩张或收缩的运动,其扩张或收缩的强度也不相同;在此同时,社会的需求总量,也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平衡的情况是暂时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即使一时平衡了,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变动中,很快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即使总量平衡,供给结构和需求

结构也会出现不适应。因为无论供给或需求，都是由千差万别的商品构成的，各种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都在不断变动，因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也在不断变动。当社会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相对平衡，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大致协调时，经济增长就较快；相反情况时，经济增长就较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经济的波动。

第三，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货币运动与商品运动的矛盾，也会引发经济波动。货币运动是商品运动的表现形式，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它的运动又可以独立于商品运动之外。货币发行量、货币流通速度、信用制度发展程度、企业之间的债务关系等等，都会对商品的生产和流通发生影响，从而对经济增长率发生影响。1989—1990年，由于紧缩信贷的力度过强，企业流动资金普遍不足，是造成生产滑坡、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第四，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地区、各部门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发展总目标存在一定矛盾，也会引起经济波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它们又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每个地区、部门、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与国家经济发展总目标发生矛盾。例如，这几年各地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影响了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从而也影响了经济增长。当国家经济发展总目标与地方、部门、企业经济利益的矛盾相对缓和时，经济增长就较快，反之，经济增长就要受到影响。

第五，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商品当事人对经济形势的了解、判断、预测和决策，与实际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也是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经济波动的

原因。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商品当事人可以借助各种科学手段,掌握大量技术、经济信息,判断经济发展前景,作出生产经营决策。这些决策,有时比较符合客观经济情况,有时不完全符合或不符合客观经济情况,前者有利于经济发展,后者则影响以至阻碍经济发展。我国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主观决策失误,因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突出事例。

由此可见,经济波动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而是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必然存在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能消灭经济波动,但可以把波动限制在常态的范围内。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往往强调经济波动是由政治原因造成的。不错,政治变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文革”期间的经济波动,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但是政治变动,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等,只是经济波动的外生因素;而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经济管理体制等,则是经济波动的内生因素。对此,本书作者明确指出:“一般说来,内生因素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只要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即使不存在政治等外生因素的影响,经济运动仍会沿着时而扩张、时而收缩的轨迹发展。而外生因素将通过内生因素对经济运动发生影响。它们可能会强化、弱化经济波动,或者导致经济波动的提前和延缓。”

二、双重转换时期经济波动的变化

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都在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模式正从数量型、粗放型、倾斜型转为效益型、集约型、均衡型;经济体制模式从集中计划经济型转为计划与市场结合型。在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双重转换时期,经济波动的机制、特点、趋势也正发生深刻的变化。研究这

一变化是本书的重点。对此，本书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

第一，研究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经济波动的变化。

如前所述，50年代以来，东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波动问题已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但他们往往只作静态分析，而忽视动态分析，对国民经济长期变动的因素，如资源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体制结构等长期变量的变化，很少涉及。本书的特点是，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经济波动的特点和波动机制的差异。应该看到，在我国双重模式转换前后，经济波动的特点是很不同的。模式转换以前，经济波动的特点是：高增长率、高波振幅、隐性失衡；模式转换时期，经济波动的特点则是：波动幅度有所缩小，隐性失衡转化为显性失衡等。

对经济波动进行动态分析，比较不同时期经济波动的变化，有助于人们较深刻地掌握经济波动的规律，了解经济波动的走向，从而为制订缩小振幅的对策提供依据。

第二，研究了双重转换时期市场取向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当前，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正逐步转变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波动类型表现出市场化的趋向。

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物资调配、资金投入、价格制定、劳力流动、工资分配基本不通过市场，由国家主管部门统一调度，经济运动中各种失衡现象采取隐蔽的形式。但在市场取向的条件下，隐性失衡显性化了。这种显性化的失衡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失衡显性化。这里既有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失衡，也有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调，产品短缺与过剩并存，或者说总量短缺与局部过剩同时并存。

其二，商品流通量与流通中的货币量失衡。在传统体制下，商品供给不足，主要采取定量供应的方式，价格长期不动。但在市场取向条件下，流通中货币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出现货币贬值，物价上涨。

其三，过剩劳动力从隐形失业转变为显形失业。在传统体制下，农民被组织在人民公社中集体劳动，不能外出谋生。劳动力不能流动。城市居民或者被分配到企业、机关工作，或者集体下放劳动。从表面看，人人有工作，人人有收入，实际上存在严重的隐形失业。当体制模式发生转换时，城乡过剩劳动力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大批农村过剩劳动力离土离乡，向城市进军。城市劳动力过剩问题也很严重。目前，城市隐形失业尚未完全显形化。但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发展，这种隐形失业必将逐步显形化。

其四，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失衡，出现了庞大的财政赤字。在传统体制下，人们习惯于财政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但这实际是假象。在国家统收统支的体制下，财政收支的平衡，往往是以牺牲人民的消费水平为代价的。改革以来，一方面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另一方面财政负担仍然十分沉重，因而几乎年年出现财政赤字。按我国现行统计口径，财政赤字累计已近千亿元；如果按国际通用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已达二千亿元以上。

市场作用的增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使各种隐形现象显形化，揭示了经济运动中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调动了商品当事人的主动性，激发了人们解决矛盾和失衡问题的积极性。从总体上看，它不是加剧而是缩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

第三，研究了双重转换时期经济波动机制混乱的表现和原因。

在双重转换时期，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结构失衡的问题。这里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有自发因素，

也有决策失误因素等等。我认为,主要原因是:

其一,计划与市场的矛盾。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主要是从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转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模式。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有着一批熟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人员,因而难以在较短时期内彻底改变。市场作用虽逐渐增大,但由于市场体系不完整、市场信号不准确、市场活动不规范、市场秩序很混乱,大大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计划与市场并存的情况下,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还未找到两者具体结合的最优方式。

其二,改革措施不完善、不协调、不配套。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单项改革到综合改革,逐步深入,逐步到位的。但社会经济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领域、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改革措施不完善、不协调、不配套,必然产生新旧体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

其三,各个地方、部门、企业、阶层和个人存在利益差异。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又存在具体利益的差别性。如何协调好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改革面临的新课题。改革以来商品当事人之间不同的利益要求,以极其顽强的态度,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渠道表现出来。盲目引进、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其突出表现。这也是造成转换时期机制混乱的重要原因。

其四,政府宏观调控机制未能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在体制转换时期,集中计划经济模式的宏观调控机制已不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新的宏观调控机制还未形成,因而,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和调控,或者沿袭已不适应的旧措施,从而束缚了商品当事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或者放任不管,不能有效地抑制市场的自发

性、盲目性和投机性。

其五，各种非经济的因素，如等级观念、政治特权等等，也助长了市场的混乱。

必须指出，转换时期波动机制和市场秩序的混乱，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既要看到混乱的暂时性，不能由此而对体制转换丧失信心；又要了解混乱的原因，研究克服混乱的对策，逐步改变混乱的状况，并尽量减少转换时期由于这种混乱所带来的损失。

三、实现常态波动的对策

经济科学是致用之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本书在详尽研究双重转换时期经济波动的变化时，对实现常态波动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策。

第一，把波动保持在“可运行区间”。

所谓常态波动，是一种非危机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波动。其上限和下限主要由以下因素确定：物质资源最大的供给能力；居民对失业、通货膨胀最大的可容忍程度；工商企业愿意接受的最低利润率；财政最大赤字限度和银行最大透支能力；国际债务最大承受能力。

常态波动的上限和下限之间，构成一个具有一定弹性的“可运行区间”。经济波动只要不越过这个“区间”，就是常态波动，具有良性循环的性质。

在质的规定性上，常态波动是一种非危机波动；在量的界定或区间的确定上，它具有以下特点：波动区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改革的进展，政府对区间界限的影响将减弱，而市场的影响将增强；企业对经济波动的承受能力及人们对物价、工资、就业变动的适应能力将会提高；在经济主

体多元化条件下,效益约束将成为界定常态区间的重要内容。

第二,采取数量型与效益型结合的增长模式。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是追求高速增长,它往往伴随着大幅起伏,经济发展很不稳定。能否采取缓速、高效的生长模式呢?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因为我国经济仍很落后,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如果缓速发展,势必将长期与发达国家保持差距,这是不可取的。而从我国当前的技术、资金、人才等实际情况出发,又难以达到高效。因此,从实际出发,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们只能实行效益与速度并重的发展战略。就是说,既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又要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

第三,提高效率与稳定投入并举。

实现数量型与效益型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是提高效率与稳定投入并举。我国发展经济的资金不足,但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在技术政策的选择中,既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原有产业的技术档次和技术水平;又要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优势。从战略目标来说,我们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但从战略步骤来说,这个转化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必须分步实施。这就是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还不能完全实现集约化经营。

第四,强化市场导向,合理配置资源。

在双重转换时期,为了实现经济常态波动,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合理配置资源。资源配置的方式,一是计划导向;二是市场导向。实践表明,采取单纯的计划导向配置资源,难以及时、准确反映社会供求关系的变动,难以保持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协调,难以达到资源最优组合,而且往往由于计划失误,还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市场导向是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当然,市场导向必须国家宏观调节和控制下,不能放任自流。如果说,市场导向是“看不见的手”,那么,国家宏观调控则是“看得见的手”。只有把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

第五，改革战略与发展战略必须协调。

为了平抑经济波动，既要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又要探索正确的改革战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模式。在改革步骤上是逐步推进、稳扎稳打，既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又不能急于求成，要与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的情况相协调。

第六，建立经济波动预警指标。

为了防止危机性的经济波动，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预警指标。其中主要的指标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居民实际收入变动率、财政盈余或赤字、外贸顺差或逆差等。预警指标的临界值不是固定不变，而是会因时、因地改变的。建立预警指标体系，可以使人们对未来经济波动有所准备，以便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出现超常波动，实现常态波动。

总之，《中国：双重转换中的波动趋势》一书，内容十分丰富，这里仅仅提出若干要点，与读者一起研究。当然，作为一部开拓性、探索性的著作，书中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希望杜辉博士精益求精，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目 录

序.....	肖灼基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风雨 40 年	[1]
第二节 三大周期学派.....	[4]
第三节 新的纵横.....	[11]
第二章 自由王国, 必然王国?.....	[13]
第一节 中程波动.....	[14]
第二节 波动·危机·周期.....	[15]
第三节 波动与“短缺失衡”.....	[18]
第四节 “超制度”根源.....	[23]
第五节 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	[28]
第三章 双重转换与波动变形.....	[31]
第一节 波动趋势的时空转换.....	[31]
第二节 双重模式大转换.....	[32]
第三节 高势位波动趋缓.....	[36]
第四节 “双向失衡”.....	[38]
第五节 “双胀高压”.....	[42]